

卜卜齋：
從口述歷史看上世紀初新界學塾與香港教育發展的關係



王肇枝中學

宋椿蕾

蔡超穎

麥詠豪

郭獻蔚

呂卓研

2013年4月

目錄

第 1 章：引言	1
1.1 圖片闡述	1
1.2 研究方法	3
1.3 章節介紹	4
第 2 章：中國傳統學塾	5
2.1 中國傳統學塾的發展	5
2.2 中國學塾教育的目的	6
2.3 傳統學塾的課程與運作	6
第 3 章：香港傳統學塾	8
3.1 以新界學塾為中心的香港前代學塾發展	8
3.2 以港島為香港中心的香港近代學塾發展	10
3.3 香港早期西式教育的發展	14
第 4 章：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	16
4.1 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概況	16
4.2 以儒家為中心的教育	17
4.3 新舊交替中的課程	19
4.4 塾師	21
4.5 學童的校園歲月	22
4.6 訓導與紀律	24
4.7 與香港主流教育接軌	25
4.8 新界學塾的沒落	26
第 5 章：總結	28
5.1 新界教育的規模	28
5.2 學塾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28
5.3 從教育看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	29
5.4 中西融和的教育模式	30
參考文獻	31

第 1 章：引言



香港自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一直受到英國政府和文化的影響，但據歷史資料顯示，英國於接管香港的初期，並未於教育方面大肆推行改革和積極發展。除了政府和教會主辦的西式教育外，沿襲中國傳統教授方式和文化的傳統學塾依然存在。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除了設立三間小型的英文小學外，並無任何參與。直至 1914 年，由於要加強對全港學校的監管，才開始小規模資助新界部分學塾。事實上，香港的首間傳統學塾力瀛書院，早於宋代成立¹。傳統私塾教育於明清時期更被新界各氏族視為其子弟考取功名的踏腳石。直至科舉制度的取消以後，私塾教育的重要性才逐漸減弱。

¹王齊樂(1982): 香港中文教育史, 頁 33。香港: 波文書局。

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可說是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式教育特色而成的。在香港教育研究的層面來說，一般著重研究 1950 年代以後的香港教育制度和課程發展，對香港開埠前和殖民政府初期的傳統學塾教育的研究有限。

雖然現時傳統學塾在香港已經沒落，但傳統學塾教育在香港教育發展的演變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新界，很多歷史悠久的小學，其實經歷過學塾、鄉村小學和現代化小學的三個階段。因此，本報告希望透過探討當年傳統學塾教育的實況，從而找出傳統學塾教育與現今的教育的關係。

1.1 圖片闡述

圖中是一間典型中國傳統學塾的上課情況，大會提供的文字，是「傳統中國私塾」。學塾，又稱私塾或「卜卜齋」。圖中所見的男性，留有長辮，應該拍攝於 1911 年以前的清代。當中有一位年長、架眼鏡的男子坐在一張有扶手的大椅子上，面前有一張大桌子，椅桌皆有雕花；他側面和前面共有七位男孩，年紀由幾歲至十幾歲不等，男孩子坐在簡陋的板凳和小桌子前。如果結合標題，以中國人長幼有序的觀念，由年紀和使用家具的規格來看，他們的關係是老師和學生。

和我們現在的上課情況相比，圖中的教室較狹小，除了書本之外，並沒有黑板等教具。由於學生身高參差，我們估計學生的年齡應該有頗大的差距。跟現今教室座位排列不同，圖中的學生上課時並不是面向老師，反之，老師和學生們是面向一幅全身直立畫像，我們估計畫像應是孔子的畫像。老師則坐在學堂後方，監察學生朗讀課文；而學堂的牆壁則掛了字畫和對聯。

1.2 研究方法

香港的中國傳統學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逐漸消失，曾經在學塾上學的人如果仍然在世，也已經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如果從訪問入手，似乎並不可行。幸好，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裡，搜尋到八十年代初由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行的口述歷史計劃，該計劃由當年聯合書院的師生在新界東進行大規模的口述歷史訪問，訪問對象是一群由五十至八十歲的村民，受訪者講及的內容廣泛。我們在目錄裡搜尋了數十份談及當年就讀私塾實況的訪問記錄加以研究，當中我們選取了由 1900 年代至 1920 年代入學的受訪者的訪問記錄作重點分析。這些訪問雖然不是由我們進行，但記錄員依受訪者的說話作記錄，並未加上個人的意見和分析，故此可視作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政府檔案方面，我們從 1914 年出版的政府年報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13*，找到一份政府首次對新界教育進行的調查報告，亦有助我們對上世紀初新界學塾有更全面的了解。



組員把相關資料影印，方便研究時再逐一細閱



我們到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找尋資料時的情況

在二手資料方面，王齊樂的《香港中文教育史》和香港區域市政局出版的《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對香港傳統學塾有深入討論，我們將兩書和訪問資料相互印證和比較，令我們對新界學塾有更深入的認識。

1.3 章節簡介

本報告將分為四個部分：在第二章，鑑於香港傳統學塾沿於中國，我們會探究一下中國傳統學塾的沿革、教育的目的和課程與運作；在第三章，我們會探究一下新界傳統學塾的前代發展，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的教育發展；在第四章，我們會深入探究上世紀初新界的學塾教育，了解其課程、師資、禮儀與紀律等內容，並分析傳統學塾沒落的原因；第五章則是本報告的總結。

第 2 章：中國傳統學塾

學塾又稱私塾，即指非官方，由私人團體或個人收生錄徒，傳授學業的教育機構。始自春秋時期的孔子¹。在本章，我們會討論中國傳統學塾的發展、目的和功能、課程與運作。

2.1 中國傳統學塾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王室日衰，戰爭不斷，「禮崩樂壞」，文化教育亦發生變化：官學衰落、私學興起。春秋時期，私塾非常蓬勃，私人講學之風甚盛，私塾遍及各地。孔子首倡「有教無類」，擴大教育對象。其學生如墨子、子思、孟軻也有聚徒講學。所以戰國後期，私塾就更繁盛了。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打破官學壟斷，為學塾立下基礎²。秦始皇採納李斯之建議，頒布「挾書令」，並禁止私塾，要求士人「以吏為師」，由政府統一實施教育，私塾衰落³。及至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指導下，不論漢代的私塾，或是官學，都有空前之發展。至唐代，私塾的教育目的和官學一樣，不是為了獲得高深的學識和技能，而是在於追求功名，競逐利祿，故唐代私塾發展蓬勃⁴。宋代的私塾大體分為兩類，分別是蒙學和經館。蒙學的的目的是以啟蒙、識字和學習基本知識；經館是在蒙學的基礎上，重點是學習儒家經典、理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兩類私塾多數統一於一校之內。及後，宋代出現書院，象徵私塾學校化、組織化，不再以講學形式教授⁵。

¹ 高明士(2004)：中國教育史，頁 103。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² 同上，頁 103。

³ 王炳照(2002)：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7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⁴ 同註 1，頁 106。

⁵ 周恩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頁 245。台北：中正書局

2.2 中國學塾教育的目的

自宋代起，學塾分為蒙學和經館，有能力接受經館教育，考取功名的學子始終是少數，更多的，是接受啟蒙教育，學習基本知識，準備投身社會的學子。王齊樂認為過去封建社會的啟蒙教育，其內容大概圍繞著三個基本目標，作為教育中心：第一是以識字為中心；第二是以普通的知識教育為中心，使兒童可以學習一些生活上必要的常識；第三是以封建思想教育為中心，使兒童及早養成在封建社會中做一個安份守紀的順民、做一個忠臣，或者是一個孝子⁶。

2.3 傳統學塾的課程與運作

先秦時期，孔子以詩書樂禮教人，弟子約三千人，門下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⁷。漢代學塾課程有蒙學，第一階段學生讀字書，字書有三、四、七字為句，如史游的《急就篇》⁸，「急就」解有不認識的字，緩急都可就求而之。它是由章句組成，用韻語把常用的字匯編在一起，用來學習識字。第二階段學習《論語》、《孝經》，學習如何做人。學習完第二階段，可在社會上謀職。假如想繼續深造，可進太學攻讀儒經⁹。魏晉南北朝時期，講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學，亦包括新內容，如玄學和科技等¹⁰。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啟蒙課本，是梁武帝時周興嗣撰寫《千字文》，全文千字，每句四字，成文葉韻，而且係對偶句。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首。是以認字

⁶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182。香港：波文書局。

⁷ 周愚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頁 237。台北：中正書局

⁸ 高明士(2004)：中國教育史，頁 121。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⁹ 王炳照(2002)：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8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¹⁰ 周愚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頁 241。台北：中正書局

為主的啟蒙課本¹¹。隋唐五代的啟蒙教材內容以宣揚倫理說教和傳授歷史知識為主，識字已退居次要地位。唐中葉後，在北方廣泛流傳的啟蒙教材是《太公家教》。內容以規勸人們接受封建倫常為主。唐代學塾教材，以經史、文選、詩文為主，以《孝經》、《論語》、《莊老》、《國語》、《尚書》、《離騷》等為輔¹²。

宋、元的學塾一般不採用班級制，教師個別授教，進度不一，因材施教。學塾訂有嚴格罰則，除罰站、跪外，還會使用戒尺「打手心」、「笞臀」等體罰。當時所使用的啟蒙教材是《三字經》，文字簡潔，善於概括，在不長的篇幅容納大量知識和道德說教。三字一句，短而諧協成韻，易於記誦，是最為流傳之啟蒙教材¹³。

¹¹ 王炳照(2002)：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103。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¹² 高明士(2004)：中國教育史，頁 123。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¹³ 王炳照(2002)：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185-187。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第 3 章：香港傳統學塾

學塾的設立，目的在於培育人才。香港雖然地處中國邊沿，與中原相距極遠，卻人才濟濟，在古代經已「孕育」出不少人才，例如鄧與璋、鄧晃、廖汝翼、廖有執等人，皆是中舉的本地人。本章將探討香港教育在新界、香港島的發展，並一同見證香港教育的進步及時代的變遷。

3.1 以新界學塾為中心的香港前代學塾發展

在現代人的概念中，香港的中心是中環，這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的發展；在英國人踏足香港以前，新界才是香港的教育中心。香港最早的教育組織，是鄧符協創立的力瀛書院。鄧符協為江西吉水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 年)進士，曾授承務郎，任廣東陽春縣令。根據鄧伯裘於 1925 年在錦田吉慶圍鐵門右方所立的碑文所指，他到達廣東後，深喜廣東風土優美，因此當他退休後，於 1102 年至 1106 年間，移居東莞縣桂角山下的錦田村¹。鄧符協自崇寧年間到這裡定居後，即開闢地方，設置田園，建築廬墓，創基立業。



清朝學子為應試科舉的文章習作。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自行拍攝。



學塾其中一個功能是為科舉考試作準備。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自行拍攝。

¹宋朝時，香港屬東莞縣轄。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33。香港：波文書局。

鄧符協好學力行，為了教育自己的子侄，他便於 1106 年至 1110 年其間，在錦田桂角山下建了一間力瀛書院。錦田《鄧氏師儉堂家譜·四世祖符協公家傳按語》中記載：「公性篤學，好交賢士。解任後，築室桂角山下，創力瀛書齋，建書樓，讀書講學，置客館、書田於里中及郭北。修橋樑，發膏火，以資養四方來學之士。樂育英才，多所造就。²」由此可見他為了教育，廣置書籍，聚友講學；而且還置書田、客館，以方便四方的來學人士。鄧符協除了捐資興學、親自教授後輩外，還廣結四方文士到來講學。由於鄧符協的努力興學，致使當時錦田區的文風大盛，成為當時新界地區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今日錦田的南北二圍，即為鄧符協所創建。他的子孫，自此也由錦田而開枝散葉，綿延擴展，世居錦田、龍躍頭、大埔、屏山、元朗、廈村等處，推為望族³。



力瀛書院雖然不復存在，但鄧族在清代設立了周王二公書院和二帝書院，為子弟提供教育。自行拍攝。

及至清代，香港所屬的新安縣，具有規模及聲譽的書院，有寶安城東門外的寶安書院、寶安城西五通街的文岡書院、寶安城南和陽街的鳳岡書院等幾間⁴。現在的新界，在清代較為偏僻，所建立學舍的規模，自然比不上縣城著名的書院來得大，但在學舍的設立、教育風氣之盛，比起其他地區，也並不遜色。現時還遺留下來的舊學舍，著名的有錦田區的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大埔區的敬羅家塾、藝

²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34。香港：波文書局。

³ 同上，頁 33。

⁴ 同上，頁 39。

浣堂、善慶書室、正倫書室；上水區的萬石堂、沙頭角區的鏡蓉書屋等，可見本港前代的教育中，新界區內的文物與教育頗為昌盛⁵。



大埔敬羅家塾。自行拍攝。



「育苗化雨」牌匾顯示敬羅家塾具教育功能。自行拍攝。

3.2 以港島為香港中心的香港近代學塾發展

隨著英國人佔據香港，他們以中環為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香港的教育發展也漸漸由新界為中心，轉移到以香港島為中心。香港島上早期的教育，都是由志願團體和熱心人士努力而建立。在那個時候，香港教育一直受到兩種不同的傳統影響：中國傳統及英國傳統。

自從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後，百多年來在英國的統治下，使香港教育在安定的社會中自由發展起來。在這百多年中，中國大陸屢次發生的紛爭，不但不妨礙香港，反而助長了香港社會的繁榮和教育的發達。同時，這個地方也成為了中國文化人士及知識分子的一個避難所，如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抗日戰爭等，令中國內地許多富貴人家和知識分子逃到香港避難，造就了香港教育發展的成功之路⁶。

⁵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43-52。香港：波文書局。

⁶ 同上，頁 11。

1841年1月26日，英國已實際佔領了香港島，至5月15日，當時估計島上的總人口已由二千增至七千四百五十人。在開埠初年，普通中國人在港島的工作，大致以捕魚、打石、築路、做小買賣及一般苦力工作居多。在七千四百五十位居民中，男性的成年人比女性的成年人多，而兒童的數目一定不大，十歲左右的學齡兒童也就更少了。1854年太平天國運動事起，廣東各地人民為了避難，紛紛逃入港島。因此香港的人口也隨之大為增加。由於香港島上的人口越來越多，教育的需求日增，港島的教育工作便漸漸開展起來⁷。

中國傳統學塾很早便在港島上建立起來了。1844年香港政府第一次公佈本港學校數字時，提及到港島上已有七間中國傳統中文學塾。在這些學塾裡，學生們直接向塾師繳交學費。而教育的主要內容只局限於背誦中文經典，和講述孔子及古代聖賢的道理。1845年，港島的中文學塾增至八間，其中兩間由外國人士所支持，全部都是設在非常簡陋的屋舍中。華民政務司(Chinese Secretary) 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便向政府提議每個月給予每間學塾十元的資助，以使中國人對港府充滿感激之心。理雅各博士也提議政府應設立一間免費學校供中國學童就讀。爹核士總督(Sir John F. Davis) 把這些提議轉呈英國政府處理。而英國殖民政府對這事也表示同情，不過就認為必須詳細考慮清楚才可作定奪⁸。當時，恰巧英國教育制度本身亦因為分配津貼給各宗派學校的問題，而充滿了宗教的爭論和派系的互相妒忌。殖民地部常務次長史提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 認為在殖民地教育方面，教會團體是最有效能和最不可缺少的幫助者。他向英國各教會團體提出徵詢，有關他們對香港教育的計劃，但到了1846年仍沒有得到明顯的表示，這時史提芬爵士認為對於公共教育的援助是不容忽視的，便同意了香港對資助的請求，對三間學塾：一間在維多利亞城，一間在赤柱，一間在香港仔，由1847年8月起，

⁷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76。香港：波文書局。

⁸ 同上，頁80。

每間每月資助十元的費用⁹。

1854 至 1859 年，鮑寧爵士令香港學塾教育有著很大的發展。鮑寧爵士代替了般咸爵士成為香港總督，他是一位有思想而沒有偏見，又熱心發展教育事業的人。他在 1854 年寫回英國的文件中提到：「這是十分令人吃驚的，一項撥給警察的費用是八千六百二十英鎊……比對之下，給與人民教育的開支，卻只有一百二十英鎊。」可見當時港府對華人教育的不重視。當時五間政府辦理的學塾，只能容納一百五十人，但香港兒童數目卻超過八千八百人。學童沒有合適的校舍，又沒有適合的教師及管理。有見及此，鮑寧總督就將那些由政府資助的學塾，全部交由政府直接辦理。這時，政府管理下的學塾，已不再是資助性質，而是由政府直接主辦的「皇家書館」(government schools)了。這些書館，當時稱為「皇家書館」、「皇家館」、「國家義學」、或「政府書館」，是本港歷史上最早的「官立學校」¹⁰。1855 年，皇家書館共有十間，學童總數為四百人¹¹。及至 1856 年 5 月，學童人數已增至六百七十五名了。由 1854 年至 1859 年，領取政府補貼費的書館數目，由五間增至十九間；學生人數也由一百零二人增至八百七十三名男生和六十四名女生；每年教育經費亦由一百二十五英鎊增至一千二百英鎊¹²。從以上來看，這是香港公眾教育發展中的第一次大躍進。政府憲報中，更公開通知學童家長，說明政府已在港島設有免費義學，內有初級中文、中國經典及地理等科目，還有英語一科，由合格教師教授。學童每月除交堂費兩個銅仙外，毋須再交任何費用¹³。

除了政府興辦的「皇家書館」之外，民間亦有不少塾館式教育。其模式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程度較高的、規模較大的，稱為書院；第二類為程度較低的、規模

⁹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80-81。香港:波文書局。

¹⁰ 同上,頁 110。

¹¹ 同上,頁 110。

¹² 同上,頁 111。

¹³ 同上,頁 113。

較小的，稱為書塾、書館、家塾、私塾、義學等¹⁴。當時教師設館教學，都用自己的名字為塾名，稱為「某某學塾」；或用教師的姓氏命名，姓李的稱為「李館」，姓張的則稱為「張館」¹⁵。比起「皇家書館」的學舍環境，一般用以開設學塾的學舍就簡陋得多。有的只有一個房間、兩層樓宇。而書塾內的學童人數普通並不多，由一名至數十名不等，很少超過百名以上¹⁶。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的塾館教育盛極一時。除了一些華人團體或一家一姓所開辦的塾館之外，還有憑個人聲望在本港設館教書的，為數亦不少。這些在本港教學的教師，在當時來說，有些是失意的文人，有些是不第秀才，更有些是逃亡的政客，不一而足¹⁷。雖然當時一般學塾中，聲譽卓著的塾師為數不少。不過，若要談對教育方面貢獻之大，影響之廣，而為後世所推崇的，則以平民教育家陳子褒老師最為著名¹⁸。

陳子褒，廣東新會外海人，生於清同治元年 1862 年 3 月 11 日，光緒十九年(1893 年)鄉試中舉，和南海康有為同科，且名列康有為之前¹⁹。陳子褒從日本回到中國後，在澳門設學。1918 年陳子褒由澳門遷校香港，設子褒學塾於堅道三十一號，後來又設女校於般含道二十五號。男女學生人數有二三百人，是當時本港最具規模的學塾²⁰。據 1921 年的《子褒學校年報》所記載，子褒學校有教員共二十名，其中亦與「皇家書館」一樣有教師教授地理、英文等科，如盧戒之教授英文，黎少壁教授算學、地理、物理、唱歌²¹。可見子褒學校的科目較舊時學塾更為多元化。除了陳子褒外，當時香港亦有不少著名的塾師開辦學塾，如何恭第所辦的恭

¹⁴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177。香港：波文書局。

¹⁵ 同上，頁 177。

¹⁶ 同上，頁 177-178。

¹⁷ 同上，頁 193。

¹⁸ 同上，頁 193。

¹⁹ 同上，頁 193。

²⁰ 同上，頁 196。

²¹ 同上，頁 197。

第學塾²²、盧湘父所辦的湘父中學²³、陳慶保所辦的慶保中學等²⁴。可見當時民間教育之興盛。

3.3 香港早期西式教育的發展

香港早期西式的教育，教會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香港早期設立的教會學校，對香港後來的教育事途，影響很大，貢獻也很多。而最先在香港島上興辦學校的基督教團體，是馬禮遜教育協會。

英國正式統治香港後，馬禮遜教育協會董事會會長顛地(Lancelot Dent)於 1842 年 2 月 21 日，寫了一封信呈給香港總督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要求港府撥地讓協會在香港興辦教育。砵甸乍爵士答應協助，1843 年 4 月 7 日，馬禮遜書院正式開設英文部，而學生對於中文的學習仍然保留。英文部由勃朗先生親自任教，中文部則由本地一位中國老師任教。1843 年 11 月，馬禮遜書院的全部工程完成，是香港島上一所規模最大，聲譽最隆的學府，申請入學的學生數目頗多²⁵。

早期香港的教育發展，其中一個特色，是女子也能入學讀書。1842 年 3 月，叔末士牧師(Rev. John Lewis Shuck)與夫人來港傳教。當他們創立浸信會禮拜堂，開設女塾的時候，美國浸信會又派包爾博士(Dr. Dyer Ball)夫婦來港傳教。不久，叔牧師夫婦所辦的塾館學童人數激增，由十五人增至五十人。為了容納更多學童，叔夫人決定再建一所學校，名為浸信會書館。浸信會書館有男生二十人，女生六人，

²²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205-206。

²³ 同上，頁 207-210。

²⁴ 同上，頁 210-211。

²⁵ 同上，頁 88-89。

學童均接受中、英文教育²⁶。

而專為女學童而設的女子書院，亦跟著成立。馬禮遜博士在 1818 年於馬六甲創立的英華書院，至 1840 年由倫敦傳道會牧師理雅各博士接掌校務，1843 年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校香港。及至 1846 年，倫敦傳道會更創辦了一所女校，名為英華女學，而創辦人為理雅各夫人，與理雅各博士只收男生的英華書院，堪稱兄妹書院。值得表揚的是，理雅各夫人那時竟然在香港提倡女學，其目光的遠大與信心的堅強，實在令人佩服。女學開始時，只有學生七名，於 1850 年增至十三名，校內學科均有中、英文²⁷。

當時除了教會辦的學校外，亦有政府辦的學校，例如歷史悠久的皇仁書院。皇仁書院是香港一間最古老的官立學校，1862 年創立，是香港首間集中英文教學於一身的中學²⁸。當時皇仁書院被稱為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College)，位於中環歌賦街。1884 年，中央書院遷址，新址位於鴨巴甸街及荷里活道之間。其後，中央書院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 年，政府將維多利亞書院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當時的皇仁書院科目種類繁多，例如有算術、語文、語法等²⁹。

雖然西式教育在香港開埠初期即蓬勃發展，但依然有很多華人將子女送到傳統學塾就學。當時本港一般的華人都喜歡將孩子送到塾館中學習，因為塾館式的教育，兒童可以隨意就讀，而塾館的教師也可以遷就家長的不同要求，比起新式學校繁瑣的規條簡單和稱心得多，這也是學塾在西式的挑戰下，依然能夠在香港蓬勃發展的原因。

²⁶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92-93。香港：波文書局。

²⁷ 同上，頁 95。

²⁸ 皇仁書院校網 <http://qc.edu.hk/>，“About QC, School History”。

²⁹ 同上。

第 4 章：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

4.1 二十世紀初新界學塾概況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但對新界的學塾全不過問。直至 1910 年代，政府鑑於辛亥革命後，不少由內地來港知識分子興辦中文學堂，與中國關係密切，並宣揚革命思想，故通過 1913 年教育條例，監管全港學校¹。

為了實施有關條例，政府考慮資助新界學塾，故此在 1913 年借調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高級中文教師宋學鵬，於新界區進行了半年的調查工作，他提交的報告，是現存有關新界學塾的最具體文件，亦反映政府對傳統中國教育的評價。當時，教育署長指出，在 1913 年以前，政府除了在大埔、元朗及長洲設立了三間小型英語學校外，對新界教育毫無參與。他根據 1911 年的人口普查，指出新界及離島居民共 80,622 人，五至十五歲之間的人口共 17,623 人；但據宋學鵬的統計，新界共有學塾 260 間，學生人數 3,223 人，故此入學率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四，比千里達和多巴哥等中美洲英國殖民地的百分之八還低²。



政府最先在新界元朗、大埔和長洲建立三間小型英文小學，元朗的一間原址，便是位於凹頭的元朗官立小學舊校舍。自行拍攝。

¹ 見潘淑華(2008)：大埔教育---從鄉村師範的建立到鄉村學校的消失，頁 213，載廖迪生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²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1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3, pp.N13-14, in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宋學鵬對新界學塾的評價甚為負面。他指那些學塾只是一間普通民居房間，房間本身又黑又髒；那些塾師視教師這個職業為副業，他們通常是江湖郎中或是風水師；在學期初，老師的薪酬並不確定，直到農曆四、五月，如果學生出席人數多，老師就能得到更多薪酬。學生平均學費金額為每年五元，他們還要支付堂費，購買以供塾師使用的茶葉，煙草和燃料；一些學生要額外支付老師的食物開支。學費有很大的不同：初學者支付的學費遠遠低於高年級學生。根據調查，大部分老師全年薪酬超過一百元，但大部分學生不會支付全部學費。他在農曆正月初五探訪學校，部分老師向他投訴上年的學費還未完全收齊。在教學效能方面，宋學鵬指那些塾師不能使用現代教學方法教授知識。學生在學校七年也不能解釋「子」字的意思；學生亦不會向老師說早晨，有訪客到訪或者回答老師問題時，也不會站立起來；當男孩們以粗言互相辱罵時，老師不會制止或懲處。宋學鵬指那些塾師並非全無救藥，建議政府對當中五十間學塾每年資助六十元³。

4.2 以儒家為中心的教育

在大會提供的圖片中，學生面對著孔子的畫像上課，因為當時私塾教育的內容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故此尊崇孔子。我們在口述歷史中不難發現，在新界私塾的禮儀中，都是圍繞著尊崇孔子的中心思想。大圍韋先生於清末入學，在開學第一天的儀式裡，家人購備雞和蔥拜孔子，有趣的是，家人在清晨四時背著他回校，並用一塊布蓋著頭，以防被那些「四眼婆」看見，到了學校便要由家人將那塊布掀起⁴。在這個開學儀式裡，反映了當時民間趨吉避凶的信仰，蔥代表「聰明」；「四眼婆」則是孕婦，代表不吉利。在入學的儀式中，塾師帶領學生叩拜孔子像，學生會預備水果，喜糕、三牲、香燭，蔥，雞及豬肉等來拜祭孔子，然後向老師

³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1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3, pp.N14-16, in Administrative Report 191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⁴徐麗儀(1981 b)：大圍韋志祥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行禮，塾師繼而執著學生的手描開紅筆⁵。開學儀式講求長幼有序和意頭，1924年出生的余季皋先生父親在家中延請塾師教育兒子，他五歲開學時，家人特別為他穿上鮮黃色的織錦長袍和馬褂，頭戴紅纓黑帽。典禮上有一套木桌椅，桌上整齊地擺放著簇新的筆、墨、硯。椅上則放了一塊剛蒸好的糯米糕。家人將他抱起放在糯米糕上，他的父親穿著深藍色的長袍，道貌岸然地坐在他身旁，把毛筆放在他的手，然後執著他的手用筆在紙上寫上他的名字。之後，余先生的父親問他：「你的書在那裡？」他就高聲將早前大人教他的答案回答：「(書)在肚子裡！」。坐在糯米糕上寓意一開始求學就黏在椅子上，養成勤學的習慣。而「書在肚子裡」的意思就是滿腹經綸⁶。



學生於入學儀式準備用以拜孔子的祭品。圖片來源：
攝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學生入學時的拜孔儀式，壁上掛著孔子畫像。
圖片來源：攝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孔誕亦是私塾的重要日子，南丫闕先生約於1920年代初入學，他說孔誕是學校的假期，村中父老會集資買豬肉拜祭孔子，儀式由老師主持，學生無須拜祭，他指出孔誕是給學生、老師和父老聚首一堂的機會⁷，具有聯誼性質。

⁵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45。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⁶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80-81。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⁷鄧燦耀(1981 a)：南丫闕保陞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4.3 新舊交替中的課程

學童在學塾學習甚麼呢？大圍韋先生於清末入學，他讀的是《四書》、《三字經》、《千字文》，最後是《易經》⁸；布袋澳劉伯於宣統三年入學，他唸的是《三字經》、《千字文》和《大學》、《中庸》⁹。上水圍廖團耀先生 1914 年入學，當時除了讀書和背景外，在「中午課程」要作對聯，寫信札，學筆算等¹⁰。宋代學塾有蒙學和經館之分，分別是啟蒙和預備科舉考試，但在以上的例子中，課程有啟蒙、有經學和作對，其實整個課程是互相聯連。陸鴻基指出學童第一個學習階段是誦讀三本「紅皮書」，分別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合稱《三、百、千》，目的是認字。第二階段是學習儒家典籍的《四書》、《五經》。《四書》分別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分別為《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清代的學生要將全書一字不漏的記誦下來，主要原因是因為《四書》、《五經》是科舉考試的基礎，當中的句子是八股文的試題。應考的士人，都要能倒背如流，才能辨認考試題目的出處。若錯認題目出處，或考試寫作的文章內容與經書的義理有偏差，考試一定不及格。之後就要學習做對聯，因為八股文就的題目是圍繞著《四書》、《五經》，考生根據題目作八對長對聯¹¹，所以課程中有作對。從以上的課程，可見當時的教育目的是為了應付科舉，由於學童可以根據天資和家境隨時退學，在社會謀生；亦可繼續學業考取功名。故此，學塾的課程便涵蓋啟蒙、經學和作對。

在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的訪問記錄中，不難看到私塾的課程在 1920 年代前後，是新舊兩種模式交替的時候。在 1920 年代入學的，很多都在舊學的基礎課程中加入新元素。黃泥頭鄭富源先生在 1914 年入學，他既讀《先進》、《孟子》

⁸徐麗儀(1981 b)：大圍韋志祥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⁹鄧燦耀(1981 b)：布袋澳劉伯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⁰李麗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¹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14-15。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和《四書》，但也讀認字的中文課本，他還記得其中一課教「人手足刀尺」，他指這是教育司署出版的教科書¹²；同村鄭佛先生於 1925 年入學，他指他讀「新書」，「人手足刀尺」和地理，而最特別的，是他的老師劉福娣，是一位師範畢業女教師¹³；大圍楊伯 1926 年入學，除了讀《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和《孟子》外，還有地理、常識和尺牘等新科目¹⁴。



私塾使用的課本。 圖片來源: 攝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學塾的課程革新，與中國和香港的教育發展有關。清政府在 1905 年廢除科舉後，很多新界的傳統私塾在課程上附加珠算、尺牘等實用的常識以應付日常的生活及謀生所需¹⁵。同時，一些新辦的鄉校因受到中國新學制的影響而按照國內的課程，在儒家的經典上融合西方的教學內容，開辦了算術、歷史、地理、公民修身等科目。其後，在 1922 及 1928 年，香港政府分別頒布了《中文課程標準》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了小學應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家政和女紅等課程¹⁶，故此造就了課程革新。

政府在 1914 年開始資助新界學塾，對接受資助的學塾亦有所監管，負責巡視學

¹²徐麗儀(1981 a)：黃泥頭鄭富源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³呂淑懿(1981c)：沙田黃泥頭鄭佛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⁴佚名(1982)：大圍楊伯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⁵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16-17。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¹⁶同上，頁 55-56。

塾的人，叫考試官或查學員。打壕墩村的袁振雲憶述，他 1920 年代讀書時，考試官一年巡察學校四次，考試官都是中國人¹⁷。蠓涌張士先生指他就學時有一位姓鍾的查學員負責巡察整個西貢區的學校，他每年到訪兩次，會向學生問書，若果學生不懂回答，會責備教師¹⁸

4.4 塾師

傳統私塾的教師亦稱為塾師或蒙師，他們多數是一些做不到官員的讀書人，他們一般都是童子和秀才，除了當塾師外，亦會替鄉民撰寫對聯、嫁娶或弔祭帖文書工作。自 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越來越多塾師從廣東地區聘任而來。1920 年代前，塾師的來源廣泛，水平參差，但亦有的是前清秀才，國內專科或師範畢業生。由於新辦的鄉村學校的經費有限，所以教師的待遇欠理想，流動性十分大，造成老師來源缺乏¹⁹。

雖然說塾師的水平參差，但在學生和家長口耳相傳間，當時新界東，特別是沙田區，便出現幾位著名塾師。黃泥頭鄭佛先生指他的老師劉福娣是當時少有的女教師，曾受教於蔡廷輝與吳耀章門下；而當年以吳耀章、許永慶和馮道良（其實是洪道良）三位是最著名的塾師，當中據說許永慶是秀才底²⁰。馬料村邱安先生指洪道良是秀才出身，但以客家話授課的羅文祥也很著名，故有「本地先生吳耀章；客家先生羅文祥」的兩句佳話²¹，情況就和今天的補習名師相似

¹⁷ 敖燕鈴(1981)：打壕墩袁振雲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⁸ 鄭華群(1981)：蠓涌張士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¹⁹ 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36。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²⁰ 呂淑懿(1981c)：沙田黃泥頭鄭佛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¹ 徐麗儀(1981 c)：沙田馬料村邱安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4.5 學童的校園歲月

上水圍廖團耀先生 1914 年入學，當時私塾每日三次上課，早上回校稱為「早次」，讀一小時書，然後背給塾師聽，跟著用毛筆練字；八時左右回家吃早飯，然後九時回校，習字一小時，之後讀書，十一時背書，然後是「中午課程」了，有時是作對聯，有時候則是令說，信扎，筆算等；十二時放學回家吃午飯，一時再回校寫字，二時半開始讀書，一小時後背書，接著塾師便開始解書至五時。五時便可以放學回家，翌日上課再把前一天塾師所講解的書向塾師背誦和解釋²²。這便是一個學童一天的學習。由於整個教學活動著重背誦，沒有現今教育中師生互動的問答，故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在大會提供的圖片中，老師是坐在學生後面。這樣，老師一方面可以聽到學生的朗讀，另一方面可以監察學生的活動，這和現今的課堂互動方式大有分別。蔡錦泉先生指出，他父親蔡廷輝一班之中分甲、乙、丙三班，三班程度不同，由此可見一位塾師同一時間在同一教室教授三班不同的學生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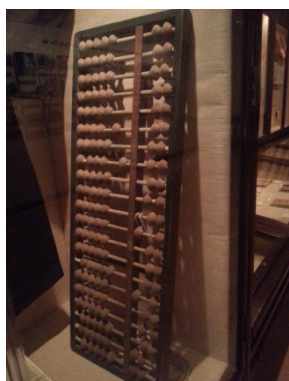
陸鴻基指當時的教育是個別化教學，學生既不分班；所以不同年歲、不同程度的學生都在同一個教室上課。塾師施教的對象是個人，不是全班。學生們分別走到塾師的大書桌前，塾師每次指點一陣子，教學生朗誦幾句課文，讀的時候用手逐個字指著，命學生記住每個字的讀音和形狀。第二天，塾師會要求學生個別背向著書本，憑記憶唸出課本；又或者對著課本，讀出塾師隨手指著的單字，學習塾師為他們安排當日的一課，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記誦課文和練習寫字²⁴。這便可以解釋，為何大會提供的圖片中，學生的年紀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學生們都是一夥人坐著，但當中有一個學生單獨走到塾師的大書桌旁邊，他便是接受塾師的個

²²李麗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³呂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⁴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12-13。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別指導。



早期私塾教學用的算盤。圖片來源: 攝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在假期方面，廖團耀先生表示學塾由每年農曆一月下旬開始，叫「開學」，十二月中旬結束，叫「解館」，整年很少假期，只有清明、四月八、端午、孟蘭、重陽和冬至等華人節慶假期，連星期日也要上課。最初沒有暑假，後來由於有查學員來校才有一個月的暑假²⁵。對於「解館」的日期，除了十二月中旬一個說法以外，亦有九月初九中旬一個說法。隔田村曾全先生指，雖然有俗語說：「九月九，先生唔走學仔走，你唔放假我放紙鳶。」但實際上，每年上課直至十二月二十一、二日²⁶。至於暑假的月份，塾師蔡廷輝之子蔡錦全先生指出是六月整個月，因為是農忙的日子，叫「放田假」²⁷。

宋學鵬指老師的薪酬並不確定，學費約每年五元，有些塾師還會要求家長支付的食物開支。我們發現每間私塾的學費有很大差異，但比較著名的塾師蔡廷輝，每名學童學費為六元，另加白米六斗²⁸。宋學鵬所指的食物開支，原來叫「魚鮓錢」，邱安先生指當時學童要每月交塾師「魚鮓錢」兩角²⁹。除了為塾師支付學費和白米外，有些塾師甚至會要求學生提供勞動服務，南丫闕保陞先生便要為老師斬

²⁵ 李麗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⁶ 呂淑懿(1981a)：隔田村曾全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⁷ 呂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²⁸ 同上

²⁹ 徐麗儀(1981 c)：沙田馬料村邱安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柴、煮飯和擔水³⁰；布袋澳劉伯要為老師斬柴、掃地、早上煲茶等³¹。

4.6 訓導與紀律

當時的學塾紀律較嚴，故懲罰較重。傳統塾師對學生的處罰有三種：「立」，即是罰企；「跪」及「責」。其中「責」即是用誠方責打學生，輕罰者打手掌，重則用誠方打在頭部或臀部³²。

蔡錦泉先生指出，他父親蔡廷輝亦有對學生施以體罰，假如有逃學的情況發生，逃學的第二天他父親便會追問逃學的緣由，若理由成立便沒有事；反之，若理由不成立，父親便會用藤條打學生的手掌。但有些塾師對學生的懲罰近乎虐待，曾經有老師發覺學生在上課時伏在桌上睡覺，就一聲不響的走到該學生前面，拿出煙槍往學生的耳邊下去，令學生的耳朵紅腫了好幾天³³。

一些接近水邊的學塾，老師對學生有很有趣的管理方法。大圍楊伯憶述，當時他的老師為怕學童戲水遇溺，會在學生的手上畫紅圈，以防止學生游水；若老師發現學生手上的紅圈不見了，便會處罰該學生³⁴。小坑口劉伯的老師不准學生到海邊玩水，便在學生的手上寫字。曾經有學生手上的字不見，老師便按規則責打學生手掌，可是學生不肯，更與幾名同學生毆打老師，最終要靠學生的家長責罰他們³⁵，由此可見學生紀律問題並非近年才出現。

³⁰鄧燦耀(1981 a)：南丫關保陞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³¹鄧燦耀(1981 b)：布袋澳劉伯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³²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41。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³³呂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³⁴佚名(1982)：大圍楊伯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³⁵鄧燦耀(1981c)：小坑口劉伯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4.7 與香港主流教育接軌

當時新界教育只限於啟蒙程度，新界學童如果要繼續升學，便要到市區升讀主流學校。隔田村曾全先生便曾升讀油麻地高級小學。他指出政府每年為隔田村學童提供三個獎學金往油麻地高級小學升學，學生由第八班讀到第四班，若想繼續學業，便要轉往香港島的皇仁書院，從第三班讀到第一班畢業³⁶。曾先生所言的升學路線和當時的學制原來大有關係。1930年代，廣州嶺南大學一位學者指出，當時香港的一百六十四所受香港政府資助、和六百七十五所不受資助的「中小學」，實際上很多都是私塾，私塾充斥是當時香港教育的特色。他指出香港教育的「主流」，就是四年私塾、八年英文書館、四年香港大學³⁷。當時官立和補助學校一般開設八年制的「英文書館」課程，最低的是第八班，最高是第一班³⁸。如果我們與現代香港教育制度作比較，當時的第八班及第七班，分別為現時的小學五、六年級；第六班至第四班，分別為現時的初中一、二、三年級；第三班及第二班分別為現時高中四、五年級。當學生完成第二班時，就相等於以前的中學畢業；若學生繼續升讀第一班，就是大學預科，可投考香港大學入學試³⁹。由此可見，新界學塾學童，和市區的學童一樣，可以透過優異成績，與香港的主流教育接軌。

香港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是新界學塾畢業生另一條出路。政府為了新界教育普及，但礙於師資難以外求，所以於1926年在大埔墟開辦「香港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以招募區內有志於鄉村教育的青年入學培訓。他們在兩年的修學期間，除了師範科目外，還有數學、歷史、地理、生理衛生及園藝農業等的科目。當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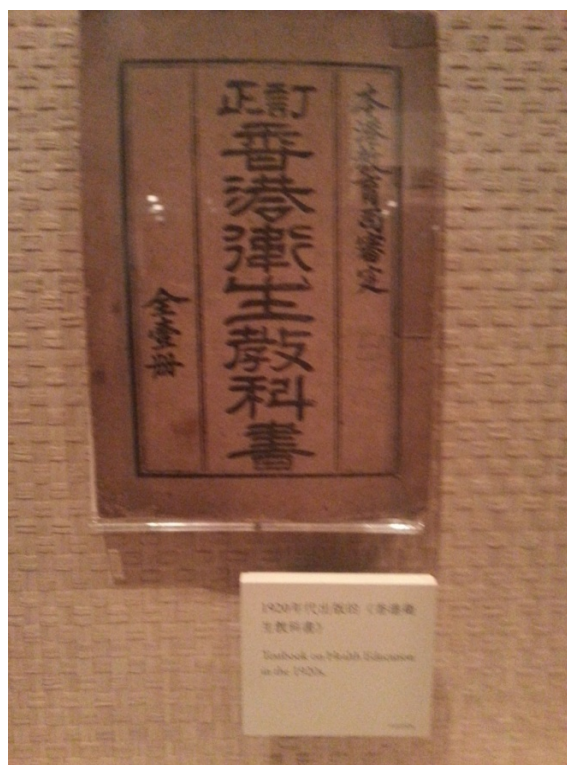
³⁶ 呂淑懿(1981a)：隔田村曾全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³⁷ 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88-89。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³⁸ 同上，頁 79。

³⁹ 同上，頁 80。戰前，香港大學為四年制大學。

學期滿了後，經教育當局的考試合格後，便可以獲政府資助，成立學校任教⁴⁰。打壕墩村袁振雲便指出，小學畢業如果成績理想，可以到大埔北約考試，做師範生，學費全免，三、四年畢業後便可當教師，好不威風⁴¹。



1920年代的衛生科課本。圖片來源：攝自香港歷史博物館

4.8 新界學塾的沒落

學塾是為了訓練學生應付科舉考試而設，但隨著清政府在 1905 年時廢除了科舉制度後，學生從私塾裏所學到的知識已經變得不實用，清政府亦在各地興辦新式的學堂和推行新式教育⁴²。

⁴⁰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36-37。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⁴¹敖燕鈴(1981)：打壕墩袁振雲訪問記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口述歷史計劃

⁴²見潘淑華(2008)：大埔教育——從鄉村師範的建立到鄉村學校的消失，頁 212，載廖迪生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從 1910 年代開始，政府開始關注新界的教育發展，但並沒有作出太大的干預，除了接受了政府資助的學塾外，新界其他學塾也是相當自由的，它們仍然維持傳統私塾的教學方式。而那些受了資助的學塾則被政府要求加入新式的課程。1910 年代末，傳統的新界私塾開始與新式學校並存⁴³。



由敬羅家塾發展出來的鄉村小學啟智學校也不敵時代巨輪而結束。自行拍攝。

在 1920 至 1930 年代，仿照美國模式四年初小、兩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新式學校逐漸有人在香港開辦⁴⁴。由於新式教育的興起，很多私塾紛紛在 20 年代至 30 年代轉型為學校，私塾從此便逐漸式微。在 1930 年代，新界區內一些較為重要的私塾都改稱為「學校」，例如 1931 年屏山的「達德學校」、1932 年上水圍的「鳳溪公立學校」和 1934 年元朗大橋村的「鐘聲學校」等，這些新式學校都在新界區教育佔了主導地位。在 1939 年，政府決定在 5 年內建立五十所中文小學作為私立學校的辦學標準，雖然這個計劃因大戰而未能實現，但亦有對中文小學產生刺激的作用，所以一向重視中文的新界學塾便順理成章地發展下去⁴⁵。到了五十年代，鄉村學校發展十分蓬勃，學校數目激增，官立學校更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傳統私塾面對這衝擊，於四、五十年代被逐漸淘汰⁴⁶。

⁴³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20-22。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⁴⁴陸鴻基(2003)：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82。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⁴⁵同註 43，頁 24。

⁴⁶同註 43，頁 26。

第 5 章：總結

5.1 新界教育的規模

宋代將學塾分為蒙學和經館：蒙學的目的是以啟蒙、識字和學習基本知識；經館是在蒙學的基礎上，研習儒家經典、理學，準備參加科舉考試¹。中國學塾的功能和模式便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有以啟蒙為主的私塾；也有為參加科舉為目的。雖然我們搜尋到的口述歷史資料和宋學鵬的調查報告中，所描述的新界學塾，都是以啟蒙為主的私塾，但在新界的前代歷史裡，以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的書院，曾經在新界出現和運作，力瀛書院、周王二公書院、二帝書院、敬羅家塾、藝浣堂、善慶書室、正倫書室、萬石堂和鏡蓉書屋等新界著名書院，都曾為新界各氏族培育子弟參加科舉，可見新界的前代教育，規模雖然不算大，但在學舍的設立、教育風氣之盛，比起廣東省其他地區，也並不遜色。

5.2 學塾教育與政治的關係

中國傳統教育的最高目標是為了科舉考試，故此一提起中國的學塾教育，我們不其然會想起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等經典和名言，以及枯燥乏味的「死背書」學習模式。清政府於 1905 年廢除科舉後，於各地興辦新式學堂和推行新式教育，傳統以儒家典籍為骨幹的學塾課程內容受到挑戰。既然不需要為科舉而讀書，學塾便在四書五經等舊課程的基礎上，加上珠算、地理、常識和尺牘等實用新科目，以應付日常的生活及謀生所需。隨著政府對新界教育加強控制，1922 及 1928 年

¹ 周愚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頁 245。台北：中正書局

分別頒布的《中文課程標準》及《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了小學應包括國文、算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衛生、英文、體操、音樂、藝術、家政和女紅等課程²，這些適應社會的新課程，對傳統學塾課程造成衝擊；加上政府開辦香港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為新界培育新教師，並資助他們開辦學校，傳統新界學塾便慢慢走向鄉村學校的模式發展。

5.3 從教育看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

在現代人的認知中，香港政治經濟中心是香港島的中環，但在英國人未來到香港以前，現今整個香港的經濟中心是新界。相比香港島，新界更接近廣東省，五大氏族中，鄧氏最早來港，他們選擇了大平原地區的元朗錦田定居；其餘四個氏族陸續在新界定居，發展農業，並建立學塾書院，故在香港地區內著名書院，正如前述，全在新界地區。相比新界，現在的香港島務農的人數不多，香港仔、赤柱等地方都是漁村，教育設施自難與新界相比。

英國透過不同條約取得現在的香港，當殖民地政府入主香港後，一直以香港島為政治經濟中心。政府一方面透過教會和政府本身興辦西式的教育機構；另一方面資助港島的華人學塾，故此在開埠短短二、三十年間，發展出一個包含中國傳統私塾、西方傳教士的教會學校和政府主辦學校的教育體系，並蓬勃發展。新界學童如果要繼續學業，便要到市區升學，可見當時的教育中心已經由新界轉移到市區。

² 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頁 55-56。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5.4 中西融和的教育模式

傳統以來，香港的教育都限於學塾形式，主要教授中國經典和儒家思想。英國佔領香港初期，西式的教育已由傳教士帶來，其後，政府對教育發展投下較大資源，興辦西式的官立學校，於是一個結合中國傳統與英國教育理念、習慣、術語的教育系統便在香港產生³。

英國入主香港，引入西方的平等思想，開始容許女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打破中國傳統，女子踏進學堂，顛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歪理。女子的身分地位提升，使社會出現了更多的人才，而中國傳統封建的舊理念，亦一步步地被進步的時代洗滌。女子不單能夠就學，還可以接受師範教育，成為教師，令女性地位提高。

其後英國開始在香港資助各種私塾，又創立皇家書館，並改革香港學校的課程，將新式的科目，例如英文、地理、歷史、物理等科引入香港，令香港教育發展得以進步。另一方面，英文中學(Anglo-Chinese School) 亦包含中文科，這亦見證中英文化在教育課程中的融合，成為香港本土教育的一大特色。時至今天，雖然我們讀儒家典籍的機會不多，唯中國傳統和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些觀念，如尊師重道和孝義等，仍是老師和學生們認為重要的思想，可見，即使香港教育很大程度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仍不失過往學塾教育主倡的一些特色。

³ 陸鴻基(2003): 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頁 32-33。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原始資料

甲 政府檔案

1. Director of Education (1914):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91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乙 訪問記錄：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計劃訪問記錄

1. 佚名(1982)：大圍楊伯訪問記錄
2. 呂淑懿(1981a)：隔田村曾全訪問記錄
3. 呂淑懿(1981b)：小瀝源將蔡錦全訪問記錄
4. 呂淑懿(1981c)：沙田黃泥頭鄭佛訪問記錄
5. 李麗梅(1981)：上水圍廖團耀訪問記錄
6. 徐麗儀(1981 a)：黃泥頭鄭富源訪問記錄
7. 徐麗儀(1981 b)：大圍韋志祥訪問記錄
8. 徐麗儀(1981 c)：沙田馬料村邱安訪問記錄
9. 敖燕鈴(1981)：打壕墩袁振雲訪問記錄
10. 鄧燦耀(1981 a)：南丫關保陞訪問記錄
11. 鄧燦耀(1981 b)：布袋澳劉伯訪問記錄
12. 鄧燦耀(1981c)：小坑口劉伯訪問記錄
13. 鄭華群(1981)：蠔涌張士訪問記錄

二手資料

甲 參考書目

1. 王炳照(2002)：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2. 王齊樂(1982):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
3. 周愚文(2001)：中國教育史綱。台北：中正書局
4. 香港區域市政局(1995)：教不倦，新界傳統教育的蛻變。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5. 高明士(2004)：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6. 陸鴻基(2003): 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7. 潘淑華(2008)：大埔教育——從鄉村師範的建立到鄉村學校的消失，載廖迪生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乙 參考網站

1. 皇仁書院校網 <http://qc.edu.hk/>，"About QC, School History"。